

引言

史稱：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後發生的第一場黨內鬥爭。

最早公開發佈的信息是，1954年2月18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闡述了全會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文中指出：「現在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即社會主義改造的階段……，這是一個比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更深刻更廣泛的革命，包含着極複雜極尖銳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方面，外國帝國主義，決不會袖手旁觀；另一方面，國內那些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決不會甘心於自己的死亡，那些將被消滅的階級也決不會沒有反抗，他們中的堅決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國帝國主義相互勾結起來，利用每一個機會來破壞我們黨和人民的事業，企圖使中國革命事業歸於失敗，使反動統治在中國復辟。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壞我們黨的團結，並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我們黨內產生過陳獨秀、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歷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在今後也還可能找到某些不穩定的、不忠實的、

以至別有企圖的分子作為他們的代理人。」¹ 這就暗示中共黨內已經發生了破壞黨的團結的重大事件，出現了類似陳獨秀、張國燾、貝利亞式的人物，即所謂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中央全會，《公報》竟然宣稱：「毛澤東同志因在休假期間沒有出席全會。」²

正式定性「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是1955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會議通過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宣佈：「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陰謀活動，以及這一活動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一九五三年達到頂點的事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活動是我國階級鬥爭形勢複雜化和深刻化的反映……。他們的這種反黨活動無疑是適應了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的願望。他們實際上已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³

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罪行，鄧小平在向全國代表會議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中，列舉了以下事實：

（一）在1953年夏季中央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高崗大大施展他的陰謀活動。他和他的追隨者不但在會上為了有意製造黨內糾紛而發表種種無原則的言論，並且在會外大肆散播各種流言蜚語破壞中央威信，特別是攻擊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想通過這些陰謀活動把這次會議轉變為對黨中央的攻擊。投機分子饒漱石也就在這時間同高崗站在一起反對中央。

1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20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265-266。

2 同上，頁264。

3 同上，頁537。

(二) 高崗的合作者饒漱石在北京以中央組織部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為中心進行新的陰謀活動。饒漱石首先在中央組織部內向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同志發動蠻橫無理的所謂「鬥爭」，然後又在九、十月間舉行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展開直接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反對黨中央的鬥爭。

(三) 當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澤東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間委托劉少奇同志代理中央工作的時候，高崗就出面反對，並且私自活動，要求由他來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要求改換政務院總理的人選，即是說要他來擔任政務院總理。這樣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的野心。⁴

有關高崗的上述「罪行」，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講述有更具體的情節：(一) 關於高崗在財經會議上的活動。薄說：「高崗利用財經會議批判新稅制錯誤之機，利用黨內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會上進行時而隱蔽時而公開的串連、鼓動，首先把攻擊的矛頭對着我，並採取含沙射影的手法，實施他的『批薄射劉』的詭計，把矛頭進一步指向少奇同志。」(二) 安子文同志未經中央授權，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同志的名單。安子文同志將這個名單給高崗看過，也向饒漱石談過。高崗「抓住這件事在高級幹部中大做文章，編造說，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無林』(即有薄一波而無林彪)，連朱總司令也沒有了。」(三)「毛主席 12 月要休假，提議由少奇同志臨時主持中央領導工作……。少奇同志謙遜地提出，還是由書記處同志輪流負責為好。書記處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贊成輪流。唯獨高崗表示反對，他一再堅持說：『輪流吧，搞輪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崗陰謀活動的本質，就是要推倒少奇同

4 《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 20 冊，頁 515-516。

志和周總理，而由他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第一副主席，同時擔任政務院總理。」⁵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平反建國後諸多冤假錯案的過程中，人們曾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一案有所質疑。1980年，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也是正確的。」⁶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寫道：「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⁷

然而，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先後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的年譜、傳記；楊尚昆日記；張明遠、張秀山、趙德尊、高克亭等當事人的回憶錄，等等，漸次披露的史料，使人們對高崗、饒漱石的「反黨罪行」和處理過程產生諸多疑竇。如：

（一）1953年的財經會議「批薄射劉」、組織工作會議「討安伐劉」的由頭究竟來自何方？高崗、饒漱石在這兩個會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二）劉少奇從財經會議到組織工作會議，再到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一再做自我批評，其原因何在？

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311、313、315。

6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93、294。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9。

(三) 把高崗在討論毛澤東外出休假由誰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會議上，贊成「輪流」主持的意見，作為高崗陰謀「篡黨奪權」的罪證，其歷史真相又是如何？

(四) 毛澤東在聽到鄧小平、陳雲反映高崗的私下活動後，採取了那些措施，何以決心拿高崗是問？

(五) 高崗為檢討錯誤求見在杭州休假的毛澤東，為何遭到婉拒？

(六) 以增強黨的團結為主題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為何以休假名義缺席？

(七) 由只作自我批評的四中全會轉向對高、饒面對面揭發批判座談會的決定是怎樣做出的，毛澤東是否知情？

(八) 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作的對高崗問題的定性講話，是否事先報毛澤東審閱？

(九) 高崗、饒漱石的真實錯誤在哪？

(十) 俄羅斯公佈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向蘇共中央通報關於高饒事件的檔案，又向人們提供了怎樣的不同的信息？

(十一) 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為何又株連出東北局和山東分局兩個「反黨集團」？

(十二) 由高、饒事件開啟的黨內鬥爭，動輒上綱「反黨」的深層原因何在？

因此，根據現有可見的文獻資料，對當年的結論重作考證，對當年的誤判及不實之詞予以澄清，對長期被作為指導黨內鬥爭的理論重作思考，就十分必要，也是長期關注中共黨史和當代中國史的人們所期待的。顯然，歷史的複雜性並非現有史料能完全展現原貌，這本《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只能是根據現有條件對上述種種謎團所作的考察，作為本人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研究高饒事件的一個小結。

第一編

關於「高、饒事件」的原有結論

高崗，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所謂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源於 1953 年夏、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中共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發生的所謂「批薄射劉」、「討安伐劉」的兩場風波。當年 12 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嚴正指出：「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指高崗、饒漱石私下勾結「陰謀反黨」。經 1954 年 2 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和會後分別召開的高崗問題、饒漱石問題座談

會，於 1955 年 3 月舉行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正式作出決議，斷言：「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活動是我國階級鬥爭形勢複雜化和深刻化的反映。」「高崗、饒漱石等人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結成了反黨聯盟，向黨的中央委員會首先是中央政治局舉行進攻，企圖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久經考驗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以便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他們的這種反黨活動無疑是適應了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的願望。他們實際上已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

第一章

高崗、饒漱石：東北、華東兩方「諸侯」

高崗、饒漱石，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完全是陌生的名字，即使1950年代、1960年代出生的中老年人，知道這兩個名字，但對其人事也知曉寥寥，因此，有必要先對這兩個歷史人物的生平作一簡要介紹。

高崗：西北根據地的代表人物

高崗，1905年出生於陝西省橫山縣。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2月進入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學習。隨後，在西北地方軍閥部隊中從事兵運工作。1932年1月，省委決定將現有的三支部隊組成「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兼第二支隊長，高崗任二支隊政委。1933年，高崗被派往轉戰陝甘邊由謝子長等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總隊。同年8月，中共陝甘邊特委決定成立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統一指揮紅軍主力、游擊隊和義勇軍，任命王泰吉為總指揮，高崗為政治委員；11月，陝甘

邊特委和臨時總指揮部聯席會議決定，恢復紅 26 軍 42 師，師長王泰吉，副師長兼參謀長劉志丹，政委高崗，政治部主任黃子文。隨後，紅 42 師在陝甘邊全面展開了創建南梁革命根據地的鬥爭，陝甘、陝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高崗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之一。

1935 年 2 月，陝北特委和陝甘邊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陝北和陝甘邊兩塊根據地和兩區革命武裝。劉志丹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5 月，紅 26 軍和紅 27 軍會合後組成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前敵總指揮部，劉志丹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不久，謝子長因病逝世。9 月中旬，由鄂豫皖根據地出發長征的紅 25 軍到達陝北根據地與陝北紅軍會師。中央駐北方局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立即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陝省委聯席會議，決定組建中共陝甘晉省委，朱理治任書記，郭洪濤任副書記；改組西北軍委，聶洪鈞任軍委主席。為統一紅軍的領導，決定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 15 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劉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崗，副主任郭述申。

同年 10 月，中共北方局派駐的西北代表團在陝北蘇區開展錯誤的肅反鬥爭，在所謂「更加猛烈地反對反革命的右傾取消主義」的口號下，將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馬文瑞、張秀山、楊森、高朗亭等人及紅 26 軍、陝甘邊區一批幹部逮捕扣押，並無辜殺害了兩百多位同志，使西北革命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在此關鍵時刻，正在長征途中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於 10 月 19 日到達陝北吳起鎮。當瞭解到劉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錯誤關押的嚴重情況後，黨中央立即派王首道等先赴瓦窑堡，向陝甘晉省委傳達中央關於：「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幹部交中央處理」的決定。從而使劉志丹、高崗

等人得救。

1936年1月，高崗任陝北騎兵團司令，被派往內蒙開闢工作，頗有建樹。同年4月，劉志丹率紅28軍東渡黃河，進軍山西，在攻打山西三交鎮戰鬥中不幸犧牲。在創建陝北和陝甘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謝子長、劉志丹先後謝世之後，鑒於在西北的歷史地位，高崗自然在黨內成為西北根據地的代表人物。在1937年5月召開的陝甘寧邊區第一次黨代表會議上，高崗雖未出席，但獲全票當選為邊區黨委委員和黨委書記（因黨中央未提名高崗，故仍由郭洪濤為書記）。不久，高崗被任命為中央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書記。同年9月以後，高崗先後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團委員，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八路軍騎兵司令等職。

193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高崗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書記。1941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黨中央委任高崗為書記。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說：為着統一整個西北工作的領導，決定將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合併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崗、王世泰、張邦英、林伯渠、謝覺哉、蕭勁光、陳正人等七人為委員，李卓然、賈拓夫為候補委員，高崗任書記。當時，中共中央設有四個中央局，即：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華中局（書記劉少奇）、西北局（書記高崗）。高崗在黨內的地位可見一斑。

毛澤東對高崗很是器重。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在講到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必須團結的問題時，就曾贊揚過高崗。他說：「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必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有進步。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和聯繫群眾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情況的瞭